

哪些企业和行业更容易吸纳就业？

——中国就业弹性的微观估计

聂辉华

摘要：为了研究政府投资的效率和方向问题，本文从企业层面估计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和行业的产出就业弹性。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0—2004 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通过以销售额作为产出的代理变量，本文发现：（1）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就业弹性最高，私营和集体企业的就业弹性居中，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最低。（2）国有企业在经济衰退时期就业弹性最低，并且具有一定的“就业稳定器”功能，但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就业弹性较高。（3）皮革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具有最高的就业弹性，而化学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和饮料制造业具有最低的就业弹性。本文的研究表明，对非国有企业加大投资有利于缓解当前的就业困局。

关键词：就业 弹性 销售额 投资 所有制 行业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因此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一直是一个难题。毫无疑问，当前世界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更是让中国的就业形势雪上加霜。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预测，2009 年全国就业人数高达 2400 万人，包括城镇新增劳动力 1300 万人（含高校毕业生 700 万人），下岗失业人员 800 万人以及其它待就业人员 300 多万人。即便 GDP 实现 8% 的增长目标，也只能解决 900 万人的就业（申剑丽，2008）。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国务院确定了在 2010 年之前总共安排 4 万亿元的庞大投资计划。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我们不禁要问：从解决就业的角度来看，4 万亿元应该对哪类企业投资？这正是本文关注的问题。我们必须知道，从微观的角度来看，哪些企业更容易吸纳就业？从产业的角度来看，哪些行业更容易吸纳就业？

宏观经济学度量就业吸纳程度的主要指标是产出的就业弹性（employment elasticity），它表示经济增长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带来的就业增加的百分点。如果以国内生产总值表示经济增长，以劳动投入表示就业，那么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可以表示为： $e = \Delta L / \Delta GDP$ 。就业弹性概念已经成为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增长和就业关系的主要分析工具，例如 Padalino 和 Vivarelli（1997）、Mazumdar（2003）进行了国家之间的就业弹性比较，胡鞍钢（1997）、张车伟和蔡昉（2002）以及简新华和余江（2007）等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估计了中国的宏观就业弹性。然而，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估计企业层面的微观就业弹性。对于政府投资决策来说，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固然是两个主要的宏观目标，但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前提是投资在企业之间和行业之间的有效率分配。如果微观层面的投资效率被扭曲了，那么宏观层面的增长和就业也会被扭曲。问题是，由于市场环境和其他约束条件不同，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会存在差异。同时，面临不同的需求条件和技术约束，由不同企业构成的行业也会有不同的就业弹性。给定政府的投资预算，在不考虑就业和增长之间的权衡取舍时，同样一块钱应该投入到哪类所有制或哪类行业的企业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就业呢？借鉴宏观就业弹性的概念，本文提出了一种测度微观就业弹性的方法。因为在经济学含义上销售额是最接近 GDP 的微观指标，所以我们用企业的销售额表示企业的产出水平，得到销售额的就业弹性，它表示销售额增加的百分比所带动的就业增加的百分比。利用微观就业弹性概念，我们可以比较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和不同行业的企业在就业吸纳程度

上的差异。

利用国家统计局 2000—2004 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库，我们构造了一个包含了大约 38 万家企业的非平衡面板。首先，我们估计了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的就业弹性，发现外资和港澳台企业的就业弹性最高，私营和集体企业的就业弹性居中，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最低。其次，我们比较了一个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的就业弹性，发现在经济衰退时外资和港澳台企业具有最高的就业弹性，国有企业仍具有最低的就业弹性；在经济繁荣时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低于外资和港澳台企业，但是高于集体和私营企业。这表明，国有企业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就业稳定器”的作用。最后，我们从企业层面比较了不同产业的就业弹性，发现皮革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具有最高的就业弹性，而化学制品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具有最低的就业弹性。在稳健性检验中，我们也从固定资产投资的角度估计了不同类型企业和行业的就业弹性。本文的发现对于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

本文剩下的部分内容如下：第二部分简单地介绍了本文的估计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描述，第四部分是主要估计结果，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二、模型

就业弹性是度量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关系的指标。在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增长通常以 GDP 的增长率来表示，而就业的增长通常以劳动要素的增长率来表示。目前，微观经济学或劳动经济学中，还没有文献从企业层面估计不同类型的企业和行业的就业弹性。^① 由于单个企业没有统计 GDP，我们必须寻找一个替代指标。GDP 表示产出的增加值，在生产函数中与企业的销售额最为接近。因此，我们以企业的销售额的增长率表示产出的增长率，以企业的职工人数表示每个企业吸纳的就业量。销售额的就业弹性就表示销售额变动的百分比所引起的企业就业数量变动的百分比。衡量产出的另一个候选变量是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但与销售额相比，这个变量有两个缺陷：第一，它表示企业的投入资本，而不是产出。第二，它是静态的，无法反映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当然，如果我们关心的是政府投资的短期效果，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也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将主要使用销售额的就业弹性，在稳健性检验中也使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

在计量模型中估计弹性的简便方法是对因变量和自变量都取自然对数，估计的系数便是弹性系数。一个典型的计量方程如下：

$$\ln labor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sale_{i,t} + \gamma \chi_{i,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其中， $labor$ 表示每个企业的职工人数， $sale$ 表示企业的销售额， χ 表示其他解释变量， ε

表示误差项。系数 α_1 就是我们估计的销售额的就业弹性，在数学上表示：

$$\alpha_1 = \frac{d \ln labor}{d \ln sale} \approx \frac{\frac{\Delta labor}{labor}}{\frac{\Delta sale}{sale}} \quad (2)$$

这样得到的就业弹性属于点弹性，比使用一定年份就业量和产值计算得到的弧弹性（如蔡昉等，2004）更加稳定，而且有利于统计检验。从劳动供给的角度看，影响就业的因素除了销售额之外，主要还有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这包括工资和各种福利。因此，我们将工资对数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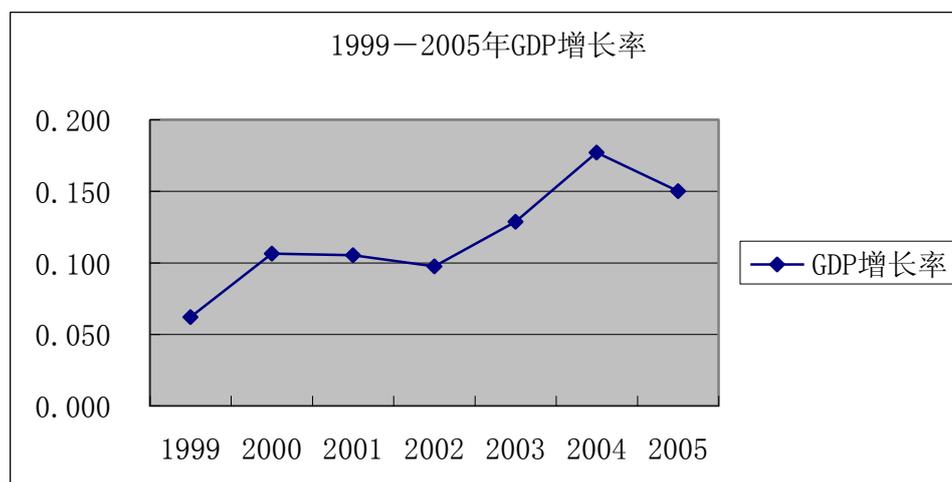
^① 胡鞍钢（1997）估计了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但是使用的数据是行业加总数据，而不是企业层面的数据。

福利对数也作为解释变量，而且这样可以观察不同类型的企业的收入就业弹性。行业性质也很重要。一般地，相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会有更少的雇佣人数。此外，企业所处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影响到劳动者的供给水平，因此我们还必须控制地区因素。注意到，我们的计量方程表明数据的结构是面板数据。微观层面的面板数据在进行经验分析时至少具有三个优势：第一，能够控制企业的个体特征，例如所有制，而加总的行业或地区层面的数据则无法反映企业层面的差别；第二，能够消除个体的固定效应，从而有利于保证估计值的无偏性；第三，能够反映随时间变化的个体特征，因此相对于横截面数据有更多的信息。

三、数据

(1) 数据来源

我们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2000—2004 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上报数据，包括全部国有工业企业和销售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其他工业企业。该数据库包括了企业的销售额、资产、职工人数、工资、福利以及所有制等基本指标。在做了必要的剔除之后，我们构建了一个 2000—2004 年非平衡面板数据集，包括了大约 38 万家企业的 89 万多个观测值。对于本文使用的数据集，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尽管我们的数据集只涉及工业（即制造业），但是它涵盖了从“农副食品加工业”到“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的总共 30 个二位数产业，既能够反映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同时又具有可比性。毕竟，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进行比较，因为三者之间在吸纳就业方面差别太大。其次，之所以选择 2000—2004 年，是因为中国经济在这一时期正好经历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图 1 显示，中国经济在 2000 年开始下滑，2002 年跌至谷底，然后开始复苏，直到 2005 年又开始下行，因此 2000—2004 年体现了经济从衰退、复苏到繁荣的一个完整周期。于是，我们可以比较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就业弹性的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

图 1 1999—2005 年 GDP 增长率

(2) 指标设计

根据计量方程，我们使用的变量包括职工人数、销售额、工资、福利，以及涉及行业性质、地区和所有制等因素的变量。数据库包含了职工人数、工资总额和福利费总额。一般

地，我们用企业的主营业务产品销售收入表示销售额。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 4754—2002）》，我们将所有工业分为 30 个二位数行业。这样的划分对于刻画企业所面临的行业技术特征来说仍显得粗糙，于是我们用资本密集度来表示行业特征，它等于企业的总资产除以职工人数，即人均资产。^① 通常来说，技术密集度越高的行业，企业的人均资产也越高。参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们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域（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分为东北、环渤海、东南、中部、西南和西北六类地区，^② 以便反映企业所在地的经济条件。我们所指的企业类型即企业的所有制类型。根据工业统计口径，所有制类型包括国有、集体、私营、港澳台、外商、联营、股份有限、股份合作以及其他等九种，后面四种成分不是很明显的类型可合称为“其他企业”。

（3）描述性统计

本文对不同类型的企业或行业的就业弹性的比较，是以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为基本分析单位。因此，表 1 提供了五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的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就每类企业平均而言，每个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在六类企业中是最多的，工资和福利也是最高的，但是销售额并不是最高的。相比之下，外资企业以更少的职工人数、更低的工资和福利总额，却创造了比国企更多的销售额。就人均水平而言，外企的人均销售额、人均工资都高于国企。

表 1：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描述性统计

企业类型	职工人数 均值	销售额 均值	工资均值	福利均值	资本密集 度均值	比例
国有企业	516	100454.6	6645.7	963.0	291.3	13.8%
集体企业	214	34713.6	1795.8	206.5	162.8	13.3%
私营企业	142	27006.4	1307.9	153.5	165.5	30.9%
港澳台企业	315	71627.2	4050.0	352.4	332.9	11.2%
外资企业	309	134780.6	5308.2	631.1	507.9	9.3%
其他企业	328	81457.8	3802.8	521.5	298.6	21.5%

注：职工人数单位为个，销售额、工资和福利单位为千元，资本密集度单位为千元/人。

四、结果

（1）所有制与就业

我们首先来比较一下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就业吸纳程度。利用式（1）作为主要计量方程，我们使用固定效应方法分别估计了 2000—2004 年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港澳台企业、外资企业和其他企业的销售额的就业弹性。估计结果如表 2。表 2 第二列表示销售额的就业弹性。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为 0.093，这意味着在 2000 年到 2004 年间国有企业的销售额每增加 1%，就业人数就增加 0.093%。在六类企业中，在控制了行业特征（资本密集度）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后，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最低，外资企业最高，港澳台企业次之，私营企业又次之，集体企业和其他企业更次之。这一结果具有非常显著的政策含义。给定政府投资预算，根据我们计算的销售额的就业弹性，投资于外资企业所带动的就业机会将是国有企业的 2 倍左右。如果单纯考虑解决就业问题，那么显然将有限的资金注入非国有

^① 一些经验研究使用人均固定资产来表示资本密集度。使用这一指标不会改变本文的主要结果。

^② 东北地区包括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环渤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和山东，东南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西南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海南、贵州和广西，西北地区包括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新疆、青海和西藏。

企业要比注入国有企业效果更好。

我们还估计了工资和福利的就业弹性。相比之下，国有企业的工资就业弹性也是最低的，这说明国有企业靠增加工资来吸引就业的效果并不好。有趣的是，国有企业的福利就业弹性是最高的。这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实行“低工资、高福利”政策，因此福利水平相对具有更大的就业吸引力。相反，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工资就业弹性很高，而福利就业弹性则很低，因为它们的雇佣策略是实行“高工资、低福利”。这是两种不同的均衡。表 2 还提供了资本密集度对就业的效应。资本密集度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吸纳的就业数量越少，因为高资本密集度的行业通常不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是非常符合直觉的。

表 2：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就业弹性（2000—2004 年）

企业类型	销售额对数	工资对数	福利对数	资本密集度	Within-R ²	观测值
国有企业	0.093 (38.85)	0.189 (58.26)	0.038 (16.94)	-0.00006 (-58.10)	0.188	108805
集体企业	0.121 (39.10)	0.199 (61.10)	0.025 (11.23)	-0.0005 (-74.51)	0.263	97242
私营企业	0.136 (59.71)	0.283 (115.18)	0.026 (16.79)	-0.0004 (-88.21)	0.368	223932
港澳台企业	0.183 (47.59)	0.266 (73.46)	0.015 (7.99)	-2.06e-06 (-13.37)	0.308	66074
外资企业	0.187 (47.95)	0.264 (69.62)	0.010 (5.34)	-4.80e-06 (-11.14)	0.323	59842
其他企业	0.100 (43.26)	0.280 (104.30)	0.036 (20.10)	-0.00003 (-40.41)	0.281	172597

注：因变量为职工人数对数，控制变量为地区。小括号内为 t 值，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2）周期与就业

均衡的就业由劳动供给和劳动需求共同决定。从需求的角度讲，就业受经济周期的影响。在经济萧条时，企业缩减经营，因此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少；而在经济繁荣时，企业扩张经营，对劳动力的需求更加旺盛。为了从需求侧反映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就业弹性，我们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 2000—2004 年这五年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衰退阶段，从 2000 年到 2002 年，此间经济增长率逐年下滑至谷底；第二阶段是繁荣时期，从 2003 年到 2004 年，此间经济增长率连续升高至谷峰。除了宏观需求的效应，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的所有制被认为是“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因为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补贴和金融约束使国有企业的投资活动具有反周期的特点（刘元春，2001）。如果国有企业是“就业稳定器”，那么它在衰退时应该比其他企业裁减更少的员工，而在繁荣时雇佣更少的员工。然而，到目前为止，似乎没有相关的经验研究对此进行过检验。

两个阶段的估计结果见表 3。在 2000—2002 年，外资企业和港澳台企业的销售额就业弹性仍然分别居于第一和第二位，私营企业和集体企业次之，国有企业仍然最低。与 2000—2004 年的估计结果相比，尽管六类企业的就业弹性的相对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就业弹性的变动幅度不同。六类企业的就业弹性变动幅度的绝对值为：国有企业 4.3%，集体企业 12.4%，私营企业 9.6%，港澳台企业 9.8%，其他企业 10%。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变化

最小，集体企业变化最大。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在经济衰退时期，国有企业的就业量对销售额的变动反应最小。假如所有企业在经济衰退时裁减部分员工，那么在统计意义上国有企业减员最少。这说明国有企业在经济衰退时期的确充当了“就业稳定器”的功能。在经济繁荣时期，虽然港澳台和外资企业的就业弹性仍然相对较高，但是国有企业的就业弹性紧跟其后，超过集体、私营和其他企业。国有企业就业弹性的提高，与其作为“稳定器”的身份不完全相符。探究这种不对称的变化显然很有意义，但是超过了本文的范围。我们猜测，在经济繁荣时期，国有企业可能凭借其政策上的优势，具有更强的扩张动力，因此就业弹性与经济衰退时期相比急剧提高。

表 3：不同阶段企业的就业弹性

企业类型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私营企业	港澳台企业	外资企业	其他企业
衰退阶段 2000—2002	0.089 (28.63)	0.136 (34.35)	0.149 (35.76)	0.165 (31.25)	0.176 (29.07)	0.110 (32.03)
繁荣阶段 2003—2004	0.135 (21.09)	0.123 (13.42)	0.112 (26.20)	0.187 (29.11)	0.183 (21.39)	0.117 (22.06)

注：因变量为职工人数对数，解释变量为销售额对数，控制变量为工资、福利、资本密集度和地区。小括号内为 t 值，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3) 行业与就业

对于宏观经济政策或产业政策而言，重要的不仅是不同企业的就业弹性，还有不同行业的就业弹性。在经济低迷时期，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须瞄准最有利于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领域。为了解决当前的就业难题，哪些行业的企业更值得投资呢？我们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T4754—2002）》，将所有样本归入 30 个二位数行业。然后以销售额作为产出的代理指标，在控制了工资、福利、所有制和地区之后，运用固定效应方法对 2000—2004 年的企业样本进行估计，计算了 30 个行业的销售额的就业弹性，并进行了排序（见表 4）。

我们的计量分析表明，“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业”、“家具制造业”和“橡胶制品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名列三甲，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和“饮料制造业”落在榜底。前三名的就业弹性是后三名的就业弹性的两倍以上，差距悬殊。如前所述，由于资本密集度与就业量呈负相关关系，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在就业弹性上应该越低。事实上，排名最靠前的三个行业的人均资产分别为 125、154 和 226，它们是理所当然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排名最靠后的三个行业分别为 313、233 和 325，它们是资本密集型行业。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浙江温州很多中小企业都是从事鞋革和家具制造，成为吸纳就业的主力军之一。从全国范围来讲，为了解决就业问题，政府应该重点支持表 4 左侧那些就业弹性较高的行业。当然，各地区情况不同，一些产业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例如石油加工业和一些金属制品业，地方政府往往会优先照顾这些本地特色产业。

表 4：30 个行业的销售额的就业弹性（2000—2004 年）

排序	行业	就业弹性	排序	行业	就业弹性
1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0.180	16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0.128
2	家具制造业	0.179	17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0.126

2	橡胶制品业	0.177	18	纺织业	0.125
4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0.168	1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0.118
5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0.163	19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118
6	金属制品业	0.161	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0.108
7	塑料制品业	0.154	22	医药制造业	0.107
8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145	23	烟草制品业	0.106
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0.145	2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99
10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0.141	24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99
10	食品制造业	0.141	26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0.098
12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0.136	27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096
12	化学纤维制造业	0.135	28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0.087
14	造纸及纸制品业	0.132	28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87
15	通用设备制造业	0.130	30	饮料制造业	0.072

注：因变量为职工人数对数，解释变量为销售额对数，控制变量包括工资、福利、所有制和地区。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

(4) 稳健性检验

从逻辑上讲，企业的投资首先要经过企业的运营转化为企业的产值或销售额，从而带动就业。因此，企业的销售额的就业弹性度量了投资的间接效果，而有时政府也许非常关心投资的直接效果。为此，我们用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数作为解释变量，看其变化比例带来的就业量的变化比例（表5）。除了国有企业和其他企业的相对位置对调，结果没有实质性变化。这说明，无论是从投资的间接效果还是直接效果来看，在解决就业方面国有企业并没有任何优势。

表5：不同类型的企业的就业弹性（2000—2004年）

企业类型	固定资产投资对数	工资对数	福利对数	资本密集度	Within-R ²	观测值
国有企业	0.088 (32.66)	0.211 (66.99)	0.043 (19.19)	控制	0.182	108805
集体企业	0.089 (34.34)	0.222 (70.45)	0.029 (13.07)	控制	0.258	97242
私营企业	0.090 (53.31)	0.316 (136.51)	0.030 (19.26)	控制	0.363	223932
港澳台企业	0.092 (26.92)	0.319 (93.09)	0.019 (10.39)	控制	0.278	66074

外资企业	0.130 (35.23)	0.315 (87.95)	0.014 (7.21)	控制	0.301	59842
其他企业	0.066 (35.85)	0.307 (121.13)	0.042 (23.27)	控制	0.276	172597

注：因变量为职工人数对数，控制变量为地区。小括号内为 t 值，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我们还估计了 30 个行业的投资就业弹性，结果有所不同。我们列举了前后五名的行业及其就业弹性（见表 6）。“橡胶制品业”和“家具制造业”仍然名列前茅，“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依然属于倒数五名之内。不过，由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没有考虑企业的投资在经营过程中的动态变化，因此我们认为销售额的就业弹性更加具有参考价值。

表 6：固定资产投资的就业弹性（2000—2004 年）

排序	行业	就业弹性	排序	行业	就业弹性
1	橡胶制品业	0.165	2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080
2	食品制造业	0.147	27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公用机械制造业	0.074
3	烟草制品业	0.142	2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61
4	造纸及纸制品业	0.131	29	医药制造业	0.060
5	家具制造业	0.119	30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0.044

注：因变量为职工人数对数，解释变量为固定资产投资对数，控制变量包括工资、福利、所有制和地区。估计系数均在 1% 的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

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的头等难题。在政府启动巨额投资计划以便刺激经济和缓解就业困境之际，理解不同类型的企业和行业的就业吸纳程度显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微观角度分析了销售额的就业弹性，比较了国有、私营和外资等不同类型的企业在 2000—2004 年间以及经济衰退和繁荣时期的就业弹性，并且测算了 30 个两位数制造业的就业弹性。

我们发现，国有企业具有最低的就业弹性，外资、港澳和私营企业具有较高的就业弹性。因此，从解决就业的角度出发，我们建议政府在启动投资计划时，能够更多地支持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因为它们是就业的主力军。虽然国有企业可以更直接地实现政府的财政政策目标，但是实现的效果则未必就更好。通过透明、公正的政府采购和招标计划，非国有企业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充分就业目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有企业更容易成为地方政府实行就业歧视的途径，如果中央政府不在“增长”和“就业”之间设计合适的激励机制，那么最终可能导致一种在就业上“以邻为壑”的增长，这将加剧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值得研究的方向。我们还发现，国有企业只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具有“就业稳定器”的功能，但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可能加剧通货膨胀。我们估计了 30 个两位数制造业的就业弹性，这有助于为当前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提供启示。

参考文献

Mazumdar, D., 2003, “Trends in employment and employment elasticity in manufacturing, 1971–92: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7: 563–82.

Padalino, Samanta, and Marco Vivarelli, 1997, “The Employment Intensity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G-7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6(2): 191-213

蔡昉、都阳、高文书，2004，“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经济研究》，第9期

胡鞍钢，1997，“中国就业状况分析”，《管理世界》，第3期

简新华、余江，2007，“基于冗员的中国就业弹性估计”，《经济研究》，第6期

刘元春，2001，“国有企业宏观效率论”，《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申剑丽，2008，“人社部：系统性促进就业政策正起草”，《21世纪经济报道》，12月24日

张车伟、蔡昉，2002，“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第5期